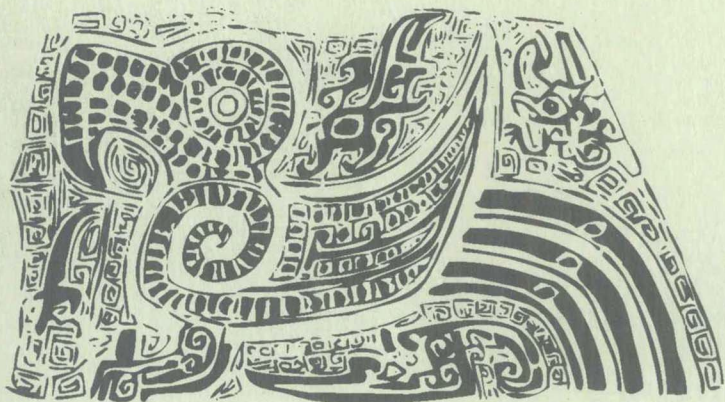


◎ 扬之水 著

史秦詩文史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先秦诗文史

© 扬之水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诗文史/扬之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4
ISBN 978-7-101-06079-9

I. 先… II. 扬… III. ①诗歌史-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古典散文-文学史-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8454号

-
- | | |
|------|---|
| 书 名 | 先秦诗文史 |
| 著 者 | 扬之水 |
| 责任编辑 | 马 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人民美术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30×960毫米 1/16
印张15¼ 字数160千字 |
| 印 数 | 1-4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079-9 |
| 定 价 | 66.00元 |
-

目 录

小引	1
----	---

卷上 文

第一章 朴素之文	10
《尚书》	10
〔附〕金石文字	21
第二章 郁郁乎“文”	24
《左传》	24
〔附〕《公羊传》《穀梁传》《国语》	57
第三章 最初的平民趣味	66
《战国策》	66
〔附〕《晏子春秋》	75
第四章 “春风扇微和”与“猛志固常在”	78
《论语》	78
《孟子》	91
〔附〕《檀弓》	100
第五章 幻丽之文	104
《庄子》	104

第六章	“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126
	《老子》	126
	《荀子》	132
	《韩非子》	137
第七章	志怪意趣	146
	《山海经》	146
	〔附〕《穆天子传》	154

卷下 诗

第一章	“思无邪”	160
	《诗经》	160
第二章	《风》《雅》寝声，奇文郁起	206
	《楚辞》	206

后记 (230)

引用文献 (232)

重印后记 (239)

小引



一

以先秦诗文史为题，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①；其二，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即诗也，文也，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或者更为自然。如此，也可不必再别为之命名，如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如抒情诗、叙事诗，等等。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我们则只从这浑然烂然、精微奥衍的丰厚中，检阅其文心文事，或曰语言的智慧和为文的用心。

二

中国文字的历史，目前可以确切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辞，而

^① 鲁迅说：“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

它已近成熟，并不是初创阶段的形貌，则其起源实应更早。近几十年来，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器上的符号，若这些符号即为原始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推演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只是对这些符号性质的认定，仍属学界正在讨论的课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辞。完整的一份王室卜辞，包括六项内容：一署辞，二前辞，三贞辞，四兆辞，五果辞，六验辞。署辞所记又分三项，即甲骨的入贡之地与入贡之人与甲骨的数量。前辞则记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字。贞辞载录卜问之事。兆辞为兆的次序与性质。卜问之后的吉凶判断，取决于王，王的断语，便称作果辞。最后，是所卜事项的实际结果，为验辞。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受内容的局限，辞句很固定，格式很刻板，记事极简略，字数多不长，它是语言的简化，而润色与铺陈无与焉。

由简化的记事而至于精练的记述事象，则有了本是卜筮之书的《易经》。《易经》把天地万物的无限复杂作成简单的既可表示时间又可表示空间的一组符号，然后用文辞呈现符号中暗示的事象，以揭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其辞恢诡，其意幽深，其所说明之事物，与其所指示之趣度，率与普通蹊径殊”，而“卦爻辞之使用文字，极变化之能事，不特全部组织复杂，即涉及事象之繁博，辞旨意趣之生动，涉笔取象之警辟，较之商代卜辞之平板无所变化，为进步多矣”^②。不过若论文体，则《易》之文体近于格言，介于诗与文之间。利用文字之韵，洗练句式，整齐文体，以求易于记

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且介亭杂文·门外谈》）。依此，文学是起源于劳动的，这也许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意见，然而这一类起源于劳动的文学，

“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于是我们缺乏讨论与研究的对象，这一意见也只好作为一个假设而存在。本书的叙述因此限定在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

^② 蒋天枢《周代散文文发展之趋势》，页123、124；载所著《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诵，易于广播，当是初始阶段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作为与诗相对的文，须待完全不依靠韵律，却只凭借叙事或说理来结构文句，或整或散，长短疏密，收纵自如，才真正是它的进步和成熟。

到了本书开篇第一节中说到的《尚书》，便已经是具有独立之文体的记言亦兼记事之文，而用来赞颂帝尧的所谓“文思安安”^①，却正不妨移赠于《书》，借用它的字面义，便是从容文思也。

可以说，先秦之文，是由史中发达起来^②。其时之国家，乃以宗族为载体，城邦，便是宗族城邦，族权与政权一致，宗统与君统一致，等级的关系即按照宗族来划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便是不同层次的宗主。而姓族、宗族、家族的维系，尤其需要明确的谱系，史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很早成熟起来，伴随它的，则是记事之文的发达。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诗文，便没有特定意义上的“史诗”。史诗的任务，似乎由记事之文来担当，已经足够。而神话最初的使命也是传述历史，同样因为史的发达，原始神话并未沿着神话的轨迹独立的蓬勃生长，却是很快变异，即其中的许多内容很早便并入古史一系。战国时代，记述神话的著作却反而多起来，恐怕与当时重建古史系统的风气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在已经不是生长神话的时代，虽经“拾遗”与“重塑”，终究无法接通早已切断的生命，它只能作为“神话色彩”而为别一种文学样式添助表现的活力。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诗文，也没有特定意义的“神话”。这也许算不得是怎样的遗憾。中国文学本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且自有它独特的辉煌。



图一 踏歌图 宋马远作。虽然只见其舞，不闻其歌，但以此怡然之态演绎《击壤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时代隔膜。当然“帝何力于我哉”，也还不是纯粹的怡然。至于把“击壤”释作以木块相击之戏，乃至形诸画图，如图二，却真的是与《击壤歌》无关了。



图二 击壤图 出自《三才图会》，明王圻等编集。

三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与谣的创作年代却很难确定为远古。比如：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语出晋人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八十老人之歌，后人命之曰《击壤歌》。且不论书之晚出，即此诗的遣辞命意，亦非帝尧时代所能有，自然无法凭信。又如：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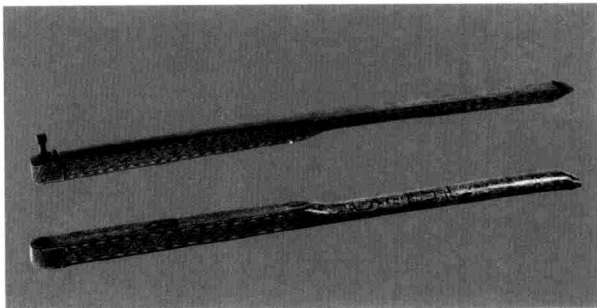
语出《孔子家语·辩乐》。旧说多以为《孔子家语》是魏人王肃伪撰，不过七十年代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与《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发现了与《孔子家语》相关的简牍，则其中的若干篇章至少在汉初即已存在。但把此诗系于舜的时代，究竟缺乏比较可靠的根据，诗作本身更不曾提供这

① 语出《书·尧典》，郑玄云：“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安，一作晏。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沉二》：“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

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

《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



图三 五弦琴 战国早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同墓所出尚有一件十弦琴。早期的琴，其形制与后世很不相同。至少弦数尚未形成定制。也有研究者认为此琴或是律准。

样的消息。而现在所能见到可命之为琴的实物，最早一件，亦属战国时期^①。

《易》之卦辞，亦文亦诗，大约有不少即取之于流传于世的诗。如“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离》），如“贲于丘园，束帛戔戔”（《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等等。其语言与文体，与《诗经》几乎无别，它的时代当然不会更早。而《诗经》的出现，则已经是周初。

四

“文学”一词，春秋时代方见于载籍。《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昺释“文学”为“文章，博学”。这是文与学二字连缀为一词之始。而这里的“文学”，一面有秩然有章、英华发外之意^②，一面也用来指对诏诰政令等典籍的熟悉。那么先秦时代“文学”之概念，大致包含了文采与博学这样两重意思，也可以说包括着对典籍的烂熟于心与巧妙运用。其时对诗文的追求，便在于尚用和尚知。尚用中包含了修辞的用心，即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尚知则包含了对学的要求。前者是“文质彬彬”之“文”，后者是“文质彬彬”之“质”，二者始则互为表里，继则圆融为一。后世的“文学”之概念，虽然在含义上有了变化，但是人们在衡量作品的时候，其实仍然使用着

^① 项阳《中国弓弦乐器史》，页76，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琴，集中在两湖地区，即楚文化范围之内，以此作为这首诗的背景，倒是合适的。

^② 刘师培曰：“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盖‘文’训为‘饰’，乃英

华外发，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见所著《论文杂记》，页118，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文采与博学的两个标准，并且，由博学而发展出来的“事出于沉思”，亦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其典贖辞章、渲染文翰之效，也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依据^③。

先秦诗文的总体风格，若用品题的方法作一简单的概括，则不妨借用《论语·八佾》中提到的一句佚诗，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是天生丽质之意。素，原是细白的缁帛。但如果把它作形容词来用，“素以为绚”，便是素以当绚的意思。《庄子》、《楚辞》之前，文和诗都可以说是“素以为绚”。《庄子》、《楚辞》出，曰“素以为绚”，其“素”，便是作了名词用，“绚”则动词也，文和诗，遂有真正的绚丽之采，而它也正是先秦诗文的完成^④。

五

本书以两卷九章分述先秦诗文之大要。不过略而未及者也并非无足轻重，只是若欲从文史哲不分的浑然中抉发独特的“文心文事”，便不能不有所选择。曰诗，曰文，本来是用了这样的标准，毕竟它不是一部先秦文献史。所谓“史”，却既非纵贯亦非横通，而只是用了“笔削”的办法在选择中体现出评价，如此立意，与其说创新，毋宁说是“复古”，而这里的选择与评价都不免带了比较多的个人色彩，但若其中的意见倘微有可取，则或许可以说，这是本书唯一的长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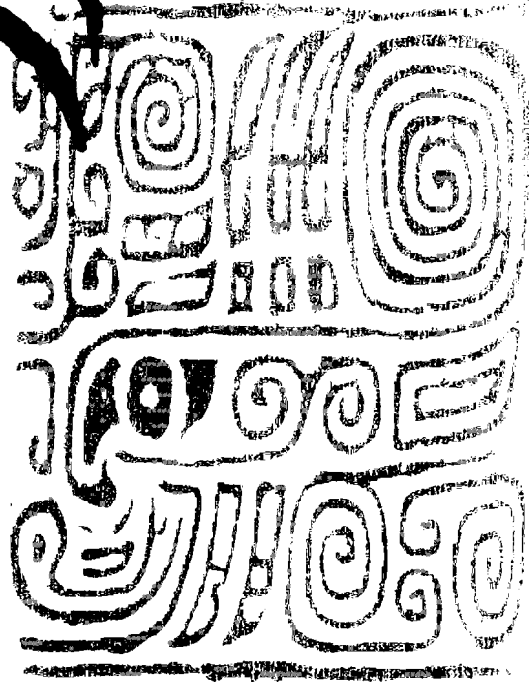
^③ 朱自清在《〈文选序〉“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④ 以形式与风格论，先秦

文章的终结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系统著书之始，而成就了一个折中和解的局面。它有纂组文字之匠心，却乏创造之生气，因此不见性情。茅坤云：“其文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子迁评〉后语》）。“沉郁孤峻”未必，“遇石而未伸”或然，则它既是先秦文章之别调，也可以说，是先秦文章的衰落之音。

文

卷
上





第一章 朴素之文

《尚 书》

《尚书》名义，孔颖达依汉儒旧义，以为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即所谓“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正义》）。不过“尚书”之名始见于伏生的《尚书大传》，先秦典籍凡引《尚书》，只称《书》，而不云“尚书”，则它至少是到了西汉方始通行。

《书》原有百篇，经历始皇焚书之祸，曾一度湮灭，汉初解除禁令，搜集得二十九篇，遂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定，称作《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子故宅的坏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写录的《尚书》，与今文者相比照，不同在于多出十六篇，因把它称作《古文尚书》。这十六篇后来亡佚，晋人乃伪作《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复从《今文尚书》中析出五篇，得五十八篇之数。此五十八篇本

自是流传千余年，至宋人方始怀疑，明代郝敬和梅鹗即已认为是伪书，经清人阎若璩悉心考订，揭明其中作伪之迹，遂成定讞。如此，《尚书》中确实可信为上古文献者，实为汉初搜集到的二十九篇。当然晋人之作伪，并非全无根据，就史的意义而论，其中也保存了若干真实的材料；但就文的一面说来，这一部分文字风格显然与《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大不相同，那么讨论上古文章，自当以二十九篇中的文字为限。

《汉书·艺文志》叙“春秋”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①若然，则《尚书》可以算作记言之文。不过《书》中的篇章并不全是记言，如《禹贡》，通篇记述九州山川贡献，全没有记言的文字。又如《尧典》、《金縢》、《顾命》等，虽记言，却兼记事，乃至以记事为主，因此所谓“言为《尚书》”，当是相对于《春秋》之记事的一个大略的划分。

《书》中所记之言，其文体则略有《誓》与《诰》与《命》的分别。约束于军中者，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又申儆于国人及臣下者亦为誓，如《秦誓》。《誓》，便是当时的讲辞。告于臣下及国人者曰《诰》，如《康诰》、《洛诰》。即不以“诰”名篇的，如《梓材》、《多方》，依其内容，亦当为《诰》之属。《命》则是任命之令辞，如《文侯之命》。《书》之记言，与记事之文相同，使用的也是通行于当时的书面语。而当时的口语与文语是分开的，《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

^① 《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宜从《汉志》作左史记言，或言则左史书之；右史记事，与此说相反。对此前人颇多考辨，金毓黻总结说：“《玉藻》之左右字，以互讹而异，社二〇〇〇年。



知也。”所谓“立具”，即叱嗟立办，发之为言，当为口语，至用文字记录下来，则为文言，即用文雅之辞来替代口语之常言。

夏、商之文，《书》中所存已很零落，《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经由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又尤其明显，当是出自东周人的追记。《周书》十七篇，以大致先后同时的《诗》与金文相比勘，即可见二者属辞相当，它的面貌自然是较近原始。商代文字，《书》之外，有甲骨、金文，但都少有长篇之作。《诗》中的《商颂》，则不出自商人之手。讨论商代之文，可以作为参照和依据的，真是少而又少。《书》中的五篇，若果然全部出诸商人手笔，那么有一点很可注意，即把周人之作用来与它相比较，则思想、观念与行文，二者几乎很少差别。我们没有实在的证据来断定周人对前朝文献作了怎样的改造，但至少可以说，它的保存下来，是特别经过了周人的认同和选择。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这里的史，当有广、狭二义，即不仅为史料，且更在于史的观念，史的意味。由此生长出来的《书》与金文，还应包括《诗》中《颂》及《雅》的大部，便不能不时时挟带史的风云，它并且以植根于清醒的内省意识和批判精神，而特有着诚挚与深厚的品质，所谓“修辞立其诚”，此类文字最足以当之。

《尚书》之《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咎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①
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

^① 吴闿生《尚书定本大义》：“格，告也。”《史记·殷本纪》：“祖己曰：王无怵，先修政事。”按此节所引《尚书》，均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一九八六